

展读遗篇泪满襟

——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

江 明

李达同志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桃李满天下，我党不少骨干和著名学者都曾受过他的教诲，吕振羽同志就是他早期的学生之一。振羽青年时期曾师事李老，崇敬之情，终身不替。李老对振羽亦深为器重，他们相交甚笃。李老给振羽的信，劫后幸存无几，现选四封发表于《文献》丛刊。从中不仅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深挚情谊，也映现了李老的精神风貌，使我们获得启示和教益。今就我所知，将李老和振羽的交往追记如下。

—

二十年代初，李达老师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长沙讲学，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的机关刊物《新时代》。自修大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培养革命干部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同志和他的许多

亲密战友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听过课。一九二三年冬，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他又到湖南大学法科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振羽最初和李达老师接触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他正是二十五岁的青年，在湖大理工科学习。他在参加学生运动中与夏明翰同志相识，经夏明翰同志介绍去湖大法科听李达老师讲“社会学”。李达老师那时虽然也不过三十五岁，但已经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了。他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深入浅出，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分析得十分透辟。这使渴求真理，好学深思的振羽非常振奋。他主动向李达老师求教，李达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他。

李达老师讲课引起强烈反响，长沙市不少进步青年都来听他的课。他还事先印发了精心编写的讲义。法科学长李希贤，是李达老师的湖南零陵小同乡，又曾同在日本留学。有一天，李希贤对李达老师说：“我看过你的讲义，你这不是我们在日本学的社会学啊！”李达老师说：“你讲的是老社会学，我讲的却是新社会学。”所以，李达老师把这部讲义，题名为《新社会学》，一九二六年六月正式出版时定名为《现代社会学》。它在革命者中广泛流传，而反动派则视为“洪水猛兽”，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辑人犯”名单上开列李达的“罪恶事实”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当一九三八年振羽在湖南，李达老师在广西，振羽怀念他，曾郑重地对我说：“李达老师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就是我听他课的讲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这部著作在当时影响之大，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些岁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会忘却的。”

二

革命风暴来五岭，一九二六年夏，北伐军攻克了湖南。时振羽毕业于湖大，他毅然参加北伐军。二十年代末，他来到北平，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老师到上海，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文化“围剿”，不顾“通辑”、抄家、毒打，他顽强不屈，一面利用大学讲坛，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面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还亲自撰写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直到被反动当局剥夺讲课的权利，才在一九三二年秋转移到了北平。振羽和他久别重逢。他们师生都曾在崎岖坎坷的革命征途中饱历忧患和颠沛，为烈火熔炼的感情更为深挚，论学议政，过从甚密。振羽至少每周一次去看望他的老师，熟悉振羽的同志也常在振羽处看到李达老师。

三十年代的北平是李达老师的新战场。进步的学生听说李达教授来了，纷纷要求学校当局聘请他。加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是李达老师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于是李达老师就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也就任了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还兼任朝阳大学等校教授。他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进步力量，推荐了黄松龄和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后来，他把中国经济系主任让给黄松龄同志担任（振羽三三年春是讲师，是年秋任教授，并先后在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计划经济、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当时，李达、黄松龄、吕振羽等同志被进步学生和进步报刊誉为“红色教授”。后来振羽回顾那时的情景说：“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反动派对我们是既仇恨又害怕的。”伪中央教育部命

令学校当局每年对教员“续聘”一次，没有接到聘书的就算被解聘，目的是为了了解聘进步教授。中国大学校方是支持反动势力的，但学生中进步势力很大，如果学校当局解聘进步教授，学生就要闹事，学校就要关门。李达老师对振羽等说：“我们就抓住这个矛盾同他们斗争！”于是学生每年都向校方提出要求续聘李达、黄松龄、吕振羽和其他进步教授，校方不敢不照办。以后，振羽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因此也就得以占据这块阵地，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那时环境很险恶，国民党反动派经常监视李达老师的行动，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那时工作很忙，在几个大学讲课，并任两个大学的经济系主任，讲授经济学、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史、货币学等课程，同时勤奋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译。他在北平五年理论的成就是很突出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概论》、《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巨著就是那时写出来的。

三

李达老师十分注重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他培养人材，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振羽就曾经说过，他自己的治学，得到李达老师的指导，“受益不小”。三十年代初，我国历史哲学战线上正开展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为了回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派配合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歪曲，振羽毅然将自己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社会史，利用大学讲坛和发表论著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老师常常给他鼓励和指点，恳切地对他说：“你搞历史很好。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

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并说：“研究中国历史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方法论，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不可误入实用主义或机械论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鉴别真伪，切不可歪曲历史的真相。”他还着重指出：“你要看看现在史学论坛上有些什么流派，每个流派有些什么基本论点，论纲如何，要搞清楚。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看哪个流派、哪些人是它最凶恶的敌人，你就对准目标斗争，来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革命。”这对年青的振羽，是多么重要的启示！这些原则，振羽是终身遵循的。振羽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史的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纲 I》）就是在李达老师指导之下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振羽常常提出问题向李达老师请教。写完后，李达老师又亲自审阅，并问振羽：“要不要出版？”振羽说：“到哪里出版？”李达老师特地为这部书写了序，并由他向佩文斋的经理常恩波推荐。这部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原始社会史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佩文斋是人文书店的前身，是一个秘密翻印和出售革命书刊的书摊子）。

哲学史是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扩展到哲学史的领域。振羽一九三六年完稿、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记录了他在李达老师指导和支持下的这一段斗争。当时在哲学史领域反马克思主义最流行的胡适派、陶希圣派、托洛茨基派诸流派中，以陶希圣的影响为最大。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流毒较广。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食货》杂志主编，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把他自己乔装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欺骗群众，颇有迷惑作用。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李达老师和振羽在一起分析形势，李达老师说：“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看哪些人是最凶恶的？”振羽说：“我想抓住陶希圣。”

李达老师肃穆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他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以他为首的新生命派是国民党的御用学派。陶希圣是危险人物，我们要与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不过，你对他一面在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斗争，不能让步，一面又不要侮辱他的人格，作人身攻击。”他沉思许久又说：“你可以到政治系教中国政治思想史，与他唱对台戏！”这时，中大政治系的学生要求到经济系听振羽的中国经济史，李达老师对他们说：“你们是政治系的，就请吕先生给你们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吧！”又鼓励振羽说：“老弟，这门课，你是担负得起的！”振羽开课以后，引起强烈反映，北大、清华、师大等校有不少学生也来听他的课，买他的讲义。陶希圣着慌了，他又是请客，又是托人。他向黄松龄同志提出，要求振羽把中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让他教，理由是北大、清华、师大等校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都是他教的，好统一起来。李达老师听了很气愤，对振羽说：“你要黄松龄去答覆陶希圣：如果他要你把中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让他教，那就要他把在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问他同意不同意！”振羽在李达老师的指导下与陶希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陶希圣碰了壁，就不再提这回事了。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中国哲学史专著，就是在讲授这门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事隔多年，振羽谈到这部书时，每每情不自禁地萦怀当年在李达老师启发和支持下的这一段战斗经历！

四

中国大学的当局虽然是支持反动势力的，但进步势力在学校占了优势，所以有红色大学之称。振羽说：“进步势力的中心人

物就是李达老师。他的威信很高，学生不听校长的，而听他的。”有一次，一个讲师在课堂上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一切都是商品，妇女也是商品。”学生问：“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他回答：“是的！”女学生问：“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商品？”那个讲师说不清楚，不敢回答。学生喊打，他慌慌忙忙往教员休息室跑，学生们围在教员休息室门口喊打。方宗鳌^①、祁大鹏^②没有办法说退学生，只好来求李达老师和振羽去解围。李达老师站在教员休息室门口对学生说：“是的，他这个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他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托洛茨基派的反动论纲。你们指出他的错误是对的。你们已经批判了他，就不要打人了，放他走吧！”于是李达老师走前面，那个讲师走当中，方宗鳌、祁大鹏跟着走当中，要振羽走后面，这样才把他们带出了校门。李达老师在校门口对那个讲师说：“你还年轻。人家都说中国大学是红色大学，这里讲的马列主义课你为什么不学，却去学托洛茨基的？这个书你就不要来教了吧！”那个讲师只得惶恐认错。

李达老师一向讨厌那种庸俗的市侩作风。他从不吹捧别人，也讨厌别人吹捧自己。振羽说，当时有位留苏的人把苏联的一本经济学教材编译了一下，说成是自己的“著作”，到处吹牛，还胡说李达老师的经济学是抄河上肇的。此人后来想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来教书，就对振羽说：“我很钦佩李达这个人。”还把他写的稿子指给振羽看，其中说李达的经济学比河上肇的好，并要振羽把这些阿谀奉承的话告诉李达老师。振羽把这些情况告诉李达老师后，李达老师说：“你去告诉他：要教书是可以的，但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很严肃的事，要老老实实，不要买空卖空，不

①中国大学教务长

②中国大学总务长

要瞎扯，不要用这种办法来换取自己的地位。”李达老师介绍他到法商学院教一个班的经济学，但此人的作风仍不老实，又在课堂上说：“李达先生讲的经济学比河上肇的好，他教你们的经济学，你们真是幸运、幸福！”李达老师知道后，在讲课时有意问学生：“河上肇的书怎么样？”学生说：“听说没有你的好。”李达老师严肃地说：“你们不要听那种不负责任的瞎说。河上肇是我的老师，我的经济学是从那里学来的！”看，李达老师就是这样正直无私，光明磊落！

五

振羽自一九三三年和李达老师在中大教课，直到一九三五年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赴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一九三六年十月又被派赴广州。一九三七年夏回北平，李达老师却离开了北平。“七七”事变后，他们中断了联系。

一九三九年七月，振羽奉周恩来同志电召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李达老师也到了重庆，是应冯玉祥将军之邀，为冯将军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住在南温泉。那时我们住在北碚对河。双方相距较远，来往交通不便。周恩来同志要振羽去看望李达老师，并征求李达老师的意见，是否愿去延安。李达老师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这时，正值平江惨案之后和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李达老师对振羽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不会失节的。”但周恩来同志出国了，董老也不在，振羽把李达老师的话告诉了当时在南方局的另一位负责同志。这位负责同志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意思是不欢迎李达老师去。是年九月，李达老师离重庆去桂林。周恩来同志回到重庆后，振羽把这些情况向他汇报了。恩来同志很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

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李达老师未能去延安，周恩来同志很惋惜。振羽常耿耿于怀。师生二人就在这茫茫的雾都，嘉陵江边的漫步，短暂聚首，又劳燕分飞。从此李达老师在腥风血雨的祖国南疆，在反动派的迫害与日寇的搜捕下，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一起度过了艰苦斗争的十年。他不愧毛泽东同志对他的称赞，是一个“真正的人”！皖南事变后，振羽和我奉命离渝，转移到敌后战场，戎马倥偬，和李达老师阔别了十年，音讯阻隔了十年！

六

全国解放后，李达老师和振羽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仍然有机会见面。一九五四年我们来北京后，每次李老来京，必来信或打电话约振羽相见，促膝倾谈，并常有书信往还。他再三提醒振羽，不要因为行政、党务工作和社会活动太忙而中断史学研究。振羽深有感触地说：“老师在这方面也是我的榜样！”

一九四九年十月，振羽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东北第一个综合性大学。一九五〇年秋，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大连大学分为几个单科学院，分校后，振羽的工作也将调动。其时，李达老师将调任湖南大学校长。是年七月，他来信邀振羽同去办湖大^①。为了青年一代，他写信鼓励振羽“约集几位同志写一本《周代社会制度研究》，科学地解决古代史分期问题^②。”他还准备在此书写成之日，写一篇读后记^③。这些信所闪耀的深邃的思想光辉和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一样，丝毫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减

① 详见七月二十四日致“振羽弟”信，“振羽弟”即吕振羽。根据信中内容判断，当为一九五〇年。

② 详见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振羽老弟”信。

③ 详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致“振羽老弟”信。

色。此时李达老师身患多种疾病，振羽很耽心，为他求医寻药，并劝他遵从医嘱安心疗养一些时候。李达老师以“继续在理论战线上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自励^①，仍顽强地坚持工作。

振羽和李达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那时李达老师在长沙主持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特地邀请振羽去参加，并要振羽会后到武汉大学去讲学。振羽说：“我是李老师的学生，不敢说去讲学，只能说我到武大再跟李老师学习！”振羽本来准备遵照李达老师的意见，会后到武大小住。但因事提前返京。他从长沙写了一封向李达老师表示歉意的信，便乘车北上，当途经武昌时，振羽拳拳系念老师，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今过武昌未下车，
心事拳拳系珞珈。
立雪当年蒙解惑，
担簦一帙走天涯。

不料奇祸飞来，振羽蒙不白之冤，途中突然横遭拘捕。十二载幽禁，出狱时，李达老师业已因忠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公开反对林彪鼓吹的“顶峰论”，早已惨遭迫害离开了人间。长沙一别，竟成永诀，能不令人黯然神伤！振羽因长期遭受迫害，病重身残，几濒于死。他多次想写文章悼念李达老师，由于手颤，难于运笔。他口述，我代他整理，也因他病重数度停笔。就在他临终前数月，犹耿耿以未能为李达老师写传为憾！

振羽对李达老师的手书珍重收藏。但十几年来，经过反复抄家，搜查，都被作为“罪证”收去。党的三中全会后，振羽沉冤平反，这几封信总算物归原主。我请人把它裱好后，拿给振羽过目，本意让他高兴高兴，谁知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看着，一动

^①详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致“振羽老弟”信。

也不动地凝坐着竟像一尊塑像，声息全无；我感到异常，突然发现他的衣襟上湿了一大片，泪水正漫着面颊往下淌流！我一下被惊呆了，连声问他：“你怎么啦！”他再也抑制不住了，泣不成声，嘴唇颤动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对不起他对我的培养！我身体这样，连给他写个传都不可能！”这时，我也不禁热泪横流。振羽是一个硬汉子，刚强果决，坦荡轩昂，从不轻易哀伤。四十余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失声痛哭！

一九八〇年春，李达文集编辑组李其驹、熊崇善等同志来访，振羽抱病热情接待，恳切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终身难忘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我认为他不仅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著述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广的。他的品德高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毫不动摇地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对我影响最深。他勤勤恳恳地把自己全部生命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我相信，在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蔚成风气以后，在他的遗文汇集出版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他、了解他，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停了一下又接下去说：“我作为他较早的学生之一，有责任撰写《李达传》，来介绍他的卓越贡献，为后人留下一点研究的资料。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可惜我现在身体不好，运笔构思，都感困难；现在你们编写《李达传》，我非常高兴，我愿意尽力帮助你们写好这本书。”言犹在耳，不料时方半年，他竟匆匆逝去。而当他翘首盼望的《李达文集》问世之日，正值党中央书记处郑重宣布为李达同志冤案彻底平反之时，但振羽已不能捧读遗篇，再一次遥奠英灵，以表达他的崇敬之情于万一了！

1981年2月1日于北京